

各路紅軍长征中的会师

马玉卿 庞大异 编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室■印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八日

毛泽东同志論长征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傳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經有过我們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間，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偵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說不尽的艰难險阻，我們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驅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請問历史上曾有过我們这样的长征么？沒有，从来沒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傳队。它向十一个省內大約两万 万 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紅軍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許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內，发芽、长叶、开花、結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們胜利、敌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

——引自毛泽东同志《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

前 言

红军长征的光辉史诗是众所周知的。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篡改、破坏，长征历史中的许多问题被搞得支离破碎，真假难分了。因此，如何实事求是地按照长征的本来面目宣传长征，即在长征这个重大的历史课题上进行拨乱反正，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长征，是指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间，中国工农红军自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 toward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战略转移。参加长征的部队有红军第一、第二和第四方面军。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和战斗在陕甘地区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虽然没有直接参加长征，但也通过各自艰苦卓绝的斗争，牵制了敌人，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为长征的胜利作了光荣的贡献。因此，各路红军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岗位上，进行了共同的英勇的战斗，共同谱写了长征的光辉诗篇，都应当受到我们的敬仰。红一方面军的长征，是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到一九三五年十月结束的。在这以前，有红七军团和红十军组成的抗日先遣队，红六军团、红二十五军，先行突围远征；在这之后，则有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最后完成长征。为了便于同志们了解各路红军长征的发展过程及其互相支援的错综复杂的情况，我们整理的这个材料，叫做《各路红军长征中的会师》。

长征的历史，首先是一部革命战争史。红军在长征中斩关夺隘，抢险飞渡，一次又一次地冲破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越过了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创造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空前奇迹。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的无上光荣。长征的历史，又是一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由于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全党的工作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随后又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路线，才保证了长征的胜利。长征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留给了我们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长征的历史，也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历史。红军在长征中克服了说不尽的艰难困苦，他们那种“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英雄气概，为我们树立了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光辉榜样。因此，长征的历史是进行阶级教育、路线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非常生动、非常丰富的宝贵教材。

红军长征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历史了，但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犹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万古永存。红军长征中创建的英雄业绩和历史功勋，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永远鼓舞着我们在新长征中奋勇前进。我们一定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党中央领导下，发扬红军“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精神，为在本世纪内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英勇奋斗。

目 录

前 言

- 一、红七军团与红十军的会师..... (1)
- 二、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的会师..... (3)
- 三、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师..... (6)
- 四、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 (11)
- 五、红一方面军与红十五军团的会师..... (17)
- 六、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 (23)
- 七、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28)

一、紅七軍团与紅十軍的会师

一九三四年七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央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发表了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和抗日武装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卖国反共政策，广泛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同时，中央军委颁发了《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训令》。七月七日，红一方面军的七军团奉命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自江西瑞金出发向闽浙赣方向进军。

红七军团是原活动于闽浙赣边区的红十军，一九三三年七月南下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与红十七师合编组成的，共六千余人。领导成员是：总指挥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

红七军团进军途中，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推行者们派来了曾洪易为中央代表。这位随军全权代表根据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地决定率领部队去进攻敌人的大城市福州市，给我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进军初期，我军以敏捷的行动和英勇顽强的战斗，沿途攻克大田、龙溪口等重镇，胜利渡过了闽江；八月一日，攻克水口，击溃守敌王敬久部，乘胜尾追敌人至福州城下，与敌人激战三昼夜，曾一度攻入市区。这初战的胜利，使曾洪易冲昏了头脑。同时，也使蒋介石大为震惊。蒋介石急调大军赶来阻截，并乞求日寇海军支援。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红七军团的指战员们虽然英勇顽强地战斗，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是自己亦伤亡很大。攻克福州是毫无希望的，形势对我军越来越不利，最后只好撤出战斗，移师北上。后来，这个曾洪易一听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已突围西征的消息，惊慌失措，立即由原来的“左”倾拚命主义变为悲观失望的逃跑主义。曾洪易认为中国革命已宣告失败，主张丢掉武器，解散部队，化整为零，转入地下活动。这个错误主张受到广大指战员坚决抵制和批判后，他就干脆扯下革命外衣，跑到南京向敌人自首，当了可耻的叛徒。

红七军团移师北上以后，攻克罗源，袭击宁德，经福安附近进军浙江，占领庆元。九月间，与闽北地区游击队取得联系，在闽浙赣边境的浦城、广丰、江山、玉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并攻占常山，歼灭守敌一部。十月间，他们留下一个营在闽浙赣边区配合当地游击队坚持游击战争，主力部队三千余人冲破敌人的六路围攻，转移至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在德兴的重溪与方志敏同志领导的新红十军胜利会师。方志敏等同志创建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以赣东北为基础，包括闽北、浙西两部分地区，新的红十军则是老红军南下后于一九三四年初奉命组建的。

两军会师后，奉命组成红十军团，下辖十九、二十、二十一师，约一万人。领导成员是：军团政治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全权负责红军抗日先遣队及闽浙赣边区的党政军工作；总指挥兼二十师师长刘畴西，军团政委兼二十师政委乐少华，军团参谋长粟裕，政

治部主任刘英；十九师师长寻淮州，政委聶洪钧，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方志敏同志在葛源主持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布置了红军主力北上后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接着，我军分两路北上。一路为先遣队，翻越怀玉山进军浙江，经常山、淳安，攻占距杭州仅八十公里的分水，然后突破敌人的阻截，转入安徽南部，攻占旌德，从泾县、宣城之间迫近芜湖。另一路为军团主力，翻越怀玉山，进军皖南，经婺源、休宁、歙县，挺进至太平。十二月间，先遣队奉命回师，与主力部队会师于太平附近的新村。

这时，蒋介石急调五个正规师、两个正规旅及浙江、安徽等省的反动地方武装共约二十万人，分四路向我围攻。由于我军当时的麻痹轻敌，且缺乏打运动战的经验，各部队协同不好，以致在黄山东麓的谭家桥一带陷入了敌军的重围之中。我军虽经浴血奋战，重创了敌人，但自己亦遭到很大伤亡。十九师师长寻淮洲、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等同志壮烈牺牲，军团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等同志负了重伤。我军在敌人的包围圈中转战于东流、祁门、休宁、太平、泾县、石埭、秋浦等地，不断地积极袭扰打击敌人。但是，敌人的包围圈日益缩小，我军伤亡日益增多，补给日益困难。方志敏同志决定组织部队突围，暂时返回赣东北老根据地，休整补充，再向中央请示下一步行动方针。

一九三五年一月，当我军通过怀玉山封锁线时，由于部队行动迟缓，没有能迅速摆脱敌人，又在婺源地区陷入了十倍于我的敌军的包围之中。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部队在浙西港头村被敌截成两段，方志敏等同志率领八百余人冲出了敌人的重围，转移到安全地区，但后面的部队两千余人被敌人截住了，不知所终。方志敏同志出于指挥员的责任心，毅然复入虎穴，把失散的部队收集起来，进行了临时整编，在纵横不到十五里的狭小地带，同敌人十四个团的兵力周旋了七昼夜，终因弹尽粮绝，七天粒米不沾，完全丧失战斗力，后被叛徒出卖被捕。

方志敏同志身陷囹圄，对革命大业耿耿于怀，继续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敌人把他拉到“庆祝胜利”大会上去“示众”，他就趁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共产主义必胜的道理；敌人用高官厚禄来劝降，他就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工农，卖国求荣的可耻行径；敌人用各种酷刑来折磨，他则表现了共产党人钢筋铁骨的英雄气概。方志敏同志在狱中，克服了重重困难，写下了《清贫》、《狱中纪实》、《可爱的中国》等光辉文献，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同年七月，方志敏同志在南昌英勇就义。

红十军团的余部八百余人，在粟裕、刘英同志率领下回到老根据地后，坚持了浙赣边境地区的三年游击战争，后来成为新四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红七军团和红十军组成的抗日先遣队，在北上途中虽然失败了，但它以自己北上抗日的实际行动和广泛宣传，推动了人民群众抗日反蒋运动的发展；它在半年多的时间中，转战于赣、闽、浙、皖广大地区，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中心，吸引了敌人的二十多万军队于自己周围，减少了红一方面军西征的阻力，从而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

的长征；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根据地人民一起，坚持了斗争，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为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光荣的贡献。

二、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的会师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命令任弼时、肖克、王震同志领导的红八军、红十六军退出湘赣革命根据地，作为红一方面军西征的先遣队，向湖南方向突围西征。命令中指出：我军突围后，第一步到达湖南桂东地域，发展游击战争，推广游击区域；第二步到达新田、祁阳、零陵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根据地；第三步横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广大地区发展并向北与贺龙、关向应同志领导的红三军取得联络。

任弼时等同志按照中央军委命令精神，立即进行了研究部署，除留下谭余保等同志领导的一部分地方武装坚持湘赣边境的游击战争外，于八月七日率领主力部队红八军、红十六军共九千七百五十八人，由江西遂川的横石、新江口地区突围，十一日到达湖南桂东的寨前坪。

八月十二日，我军在寨前坪的河滩上召开了西征的誓师大会。会上，正左宣布了中央军委关于成立红军第六军团的命令，其领导成员是：中央代表任弼时，总指挥肖克，政治委员王震，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并宣布由任弼时、肖克、王震同志组成军政委员会（任弼时同志任主席），作为西征行动的最高领导机关。

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鉴于敌人对我军围堵部署尚未完成和敌在湘江布防尚属薄弱的情况，决定放弃在湘东南建立游击区域的计划，提前执行军委命令中提出的第二步计划。十二日晚上，率领部队从寨前坪出发，经汝城的田庄、资兴的滁口，顺利通过了敌人的防堵线，攻占东江，进入郴县，穿越耒阳、宜章公路，绕过桂阳，攻占新田。八月二十三日，我军进抵湘江东岸，佯攻零陵，准备从蔡家阜至略江之间的浅水处抢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地区挺进。

这时，蒋介石命何键急调九个团的兵力赶到湘江布防。我军根据敌情变化，当即放弃原定的渡江计划，折转东南，向阳明山地区挺进，打算建立以阳明山地区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但当我军到阳明山地区后，发现这里地瘠人稀，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条件极为困难；同时，湖南军阀何键所部的两个整师和两个旅共约四万余人分三路向我围攻。我军又当机立断，决定趁敌人完成合围部署之前，跳出包围圈，向南突围。

二十六日，我军从阳明山之祖师庙出发，东出祁阳的白果，绕过敌人第十五师的侧翼，急转南下，于二十九日到达嘉禾附近。开始，敌人判断我军是要重返湘赣根据地，于是急调大军防我东进；当其发现我军到达嘉禾时，又重新部署，急调大军向南追击。我军则以连续三天的急行军，先由文家掉头西进，通过浦口进入兰山的土桥；然后经洪观圩、楠门桥，进抵宁远的下灌；再经道县以南的洲背、茶园渡口，渡过沱水，到达湘

桂边境的蒋家岭，从而打破了敌人的围堵计划。

我军毅然改变行动方向和高速度地运动，使敌人疲于奔命，到处扑空。何键无可奈何地哀叹说：红军“时而声东击西，行踪飘忽，作圈子策略”，使“我十五、六师跟踪追逐数千里，从未遇其主力”！何键承认“敌情不明，军队疲于奔命”，大骂其部属“毫无明确之报告”。

九月二日，我军在蒋家岭附近之螺壳界、金山独岭，击溃敌人一部，于三日进抵广西灌阳以北地区，在这里利用有利地形，摆开阵势，以逸待劳，一举击溃了敌第十六师、第十九师八个多团。然后，在全州以南的界首从容地渡过湘江，进抵资源。

九月八日，红六军团在资源之车田，接到了中央军委训令。训令指出：六军团最可靠的活动地域是湖南的城步、绥宁、武冈山地。训令要红六军团最少在九月二十日前保持这一地区，并消灭敌人一旅以下单个部队，发展苏维埃运动；然后沿湘桂边境行动，经绥宁、通道到贵州之锦屏、天柱、玉屏、铜仁，再转向湘西凤凰地区，协同红三军于湘西及湘西北地区发展苏维埃及游击运动，并于凤凰、乾城、永绥地区，背靠贵州，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一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敌人于湘西北方向，直接配合即将突围长征的红一方面军的行动。

红六军团遵照中央军委的训令，于九月九日，从车田出发，向西急进。十一日进抵城步以西的丹口。原计划在绥宁以东的安岳山、桐油坪、赤坡地区展开，向东推进，但因敌情变化，未能得手。后又准备在绥宁以西地区打击西进之敌，但当我前卫十八师刚过小水时，遭到了湘敌第五十五旅的突然袭击，被截为两段；同时，湘、桂、黔三省敌军频繁调动，从三个方面向我压来，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我军当即决定：放弃原来的行动计划，突破驛马，夺路南下。我军于十六日进抵通道的菁芜洲，十七日占领通道，十八日进抵靖县之新广地区。十九日，我军在靖县之金线吊葫芦打了个胜仗，击溃了湘敌补充第二总队两个团，毙伤敌人二百余人，俘敌三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三百余支。这一仗，大长了我军的威风，大灭了敌人的志气，从此以后，湘敌不敢轻易尾追。我军便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迅速地向贵州锦屏、黎平方向前进，边打边走，途中歼灭了黔军两个团，跳出了湘、桂、黔三省敌军的包围圈。然后又以急行军冲破敌人的封锁线，经镇远、施秉、黄平等地，到达了瓮安地区。

十月四日，红六军团在瓮安的猴坊接到了中央军委的命令。命令指出：桂敌现已向南开动，红三军已占印江，六军团应迅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六军团遵命于十月五日从瓮安的猴坊出发，掉头向东北方向前进。十月六日，进入石阡地区，准备到甘溪稍事休整，然后利用夜间越过石阡、镇远大道，进入江口。但是，由于中央军委命令中对敌情判断的错误，没有觉察湘、桂、黔三省敌人的联合作战计划，加上我六军团前卫部队在进入甘溪时戒备疏忽，以致遭到桂敌第十九师的突然袭击。我军未能迅速摆脱敌人，形成胶着状态，敌军分三路向我合围，使我军陷入了湘、桂、黔三

省敌人二十四个团的合围之中，部队一度被截为三段，形势十分严重。我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化整为零，分成小股部队，转战于石阡、余庆、施秉之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分别爬过了荒无人烟的丛山峻岭，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保存了部队的战斗力量。十月二十四日，红六军团三千余人 与贺龙、关向应同志领导的红三军会师于印江的木黄。尔后，两军转移到四川酉阳的南腰界。至此，红六军团和红三军分别打破了敌人围追堵截与各个击破的企图，胜利完成了会师的战略任务。

红三军的前身是红二军团。红二军团是一九三〇年在湖北的公安成立的，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周逸群（后为邓中夏），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直荀。下辖两个军，即酃继勋、段德昌同志领导的活跃于鄂西洪湖地区的红六军；贺龙、周逸群同志领导的活跃于湘西桑植、大庸地区的红二军。一九三二年，红二军团撤出洪湖地区，转移至湘、鄂、川、黔边界活动，在这里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部队改编为红三军。在红六军团前来会师的前夕，红三军奉命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因此，历史上把这次会师叫做红二、六军团的会师。

十月二十八日，红二、六军团在四川酉阳的南腰界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大会，庆祝红六军团突围转移胜利，也是动员两军指战员团结、战斗，夺取更大胜利的誓师大会。贺龙同志说：“六军团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一路上爬山涉水，打了不少的胜仗，来到了这里，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你们到这里后想休息一下。按说，这是应该的。可是蒋介石这个卖国贼，不让我们休息。这里的根据地是新近才开辟的，不很巩固。现在可靠的根据地是在我们的脚板上！敌人还在追我们，所以我们还要走路。今天开个大会，明天就要出发啦！”任弼时同志在讲话中号召：“两支兄弟部队要亲密团结，互相学习。我们要打更大的胜仗，来庆祝我们的会师。”

两军会师以后，在政治上确立了以中央代表任弼时同志为首的领导机构，成立了党的湘鄂川黔省委，任弼时同志兼任书记，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夏曦、张子意等同志为委员；在军事上成立了湘鄂川黔总指挥部，贺龙同志为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为政治委员；并成立了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两军团共有六七千人，三千多支枪。

省委正确分析了敌我形势，向中央军委建议，集中两个军团的兵力，回到湘西老根据地，向敌人侧后进攻。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从此以后，红二、六军团就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九日，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一带出发，集中兵力向湘西发动攻势。三十日，我军首克酉阳，经百户进入湘西地区；十一月七日，攻占永顺。这时，湘西军阀陈渠珍纠集周燮卿、龚仁杰两个旅和贵州军阀杨其昌旅，共一万余人，向我反扑。我军决定诱敌深入，利用有利地形歼灭敌人。于是主动撤出永顺，以一部兵力与敌保持接触，边打边退，诱敌尾追；主力部队则抢先半日转移至永顺以北九十里处的山高林密的狭长谷地，设伏待敌。十六日黄昏，敌人进到龙家寨、碑里坪，准备宿营。我预伏

在当地东、西、北三面山上的部队，一齐向敌人发起猛攻，激战两小时，歼敌周、龚两旅大部，俘敌参谋长一人。在乘胜追击中，又在扒总河击溃了杨其昌旅，复占永顺；然后分兵扩大战果，占领了桑植、大庸等城和广大地区。我军主力沿沅江神速东下，在桃源沅溪河歼灭鄂敌罗启疆第三十四旅一个团，击溃由常德、桃源前来增援的两个团，乘胜占领了桃源、慈利，围攻常德，威胁岳阳、长沙。

我二、六军团的凌厉攻势，使湘、鄂军阀惊慌失措，连连向蒋介石告急。蒋介石不得不改变其集中全力围追我红一方面军的作战计划，急忙从湘南前线抽调其第十六、十九、六十二师，兼程北上；令其远在江西的郭汝桂师驰援常德；调李云杰、李抱冰两个纵队四个师到湘黔边境布防。

红二、六军团的辉煌战果，扩大和巩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打乱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部署，有力地配合了红一方面军的长征。

三、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师

一九三四年九月，中央决定红二十五军突围远征。

红二十五军原属红四方面军的序列，在危难中建立，在战斗里成长。一九三二年十月，活动于鄂豫皖边区的红四方面军主力，由于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未能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而退出根据地“转移外线”后，蒋介石又以二十万兵力大举进犯根据地，人民惨遭烧杀掳掠。为扭转根据地的危急局面，鄂豫皖省委十一月二十九日决定：把分散留在各地坚持斗争的二十五军特务营和七十五师两个团，二十七军的三个团集中起来，重建二十五军。这个军下辖七十四师和七十五师，后来几经整编，并与二十八军合编，不断充实力量。他们为反对敌人的“围剿”、“清剿”，保护根据地的群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四日，红二十五军奉命到鄂东北集结待命。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同志派专人送来的信上说：“党中央派来鄂豫皖工作的程子华同志已到道委，建议省委率红二十五军来鄂东北，研究今后行动计划。”省委决定立即行动。当晚，政治委员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和参谋长戴季英、政治部主任郭述申，率领全军两千八百多人，从皖西的六安、霍山地区出发，火速前进。一天两夜接连突破敌人设于商城和麻城之间、商城和新集之间、新集和双柳树之间、仁和集和砖桥公路之间的四道封锁线，歼敌两个团又四个连，于第三天上午进入到光山县南面的斛山寨。部队刚一住下，敌人便三面围了上来。我军坚守阵地，挫敌锐气，黄昏时一举反击过去，把敌人打垮，俘敌四千余人，缴获机枪一百多挺。我军伤亡亦很大，七十五师金师长负伤，姚志修政委牺牲。我军掩埋了烈士，安置了伤员，释放了俘虏后，又连夜前进。次日下午到达宣化店以北的殷家湾，见到了郑位三同志。

鄂豫皖省委在殷家湾召开会议。首先由郑位三同志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内容大意是：鄂豫皖苏区经过敌人第四次“围剿”，人力、物力损失甚大，粮食已空，红二十五军应离开老苏区，开辟新的根据地。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除留下部分干部和部分武装再组建二十八军原地坚持斗争外，主力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十一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踏上了征途。在信阳、武胜关之间越过平汉铁路后，由于遇到了敌人三十多个团的拦阻，乃改变进军路线，从随县、枣阳一带折回河南，经桐柏和泌阳、唐河之间，向伏牛山区挺进。二十六日下午，在方城的独树镇附近，遭到敌人四十军一一五旅和骑兵团的突然袭击。在这危急关头，吴焕先政委挺身而出，手举大刀，高呼：“同志们，这是生死存亡关头，决不能退！共产党员跟我来！”带领一个连冲了上去！徐海东副军长带领的一个团正好赶到。两支人马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终于打退了敌人，顺利进入伏牛山区。随后，经嵩县、欒川、卢氏一带，打破敌人的阻截，到达陕西雒南的庚家河。

十二月十日，省委在庚家河开会，研究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新的根据地问题。正在开会时，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我军奋起还击。程子华军长、徐海东副军长在战斗中负了重伤。二二三团团长带头同敌人拚刺刀，腿断了仍坚持指挥作战。终于打垮了敌人，歼敌八百多人。会后，整编了部队，便开始行动。一九三五年一月上旬攻克镇安县城；一月下旬袭占柞水城，歼敌一个营；二月上旬在葛牌镇南面的文公岭歼敌两个营，并争取了一个连起义；二月下旬，经郧西西进，连克宁陕、佛坪两县；三月上旬进抵洋县华阳镇，在华阳东南的西塔寺打垮敌人五个营，毙伤敌人二百多，敌旅长张飞生亦被打伤；三月下旬，部队东返，又于四月中旬攻克雒南县。我军所到之处，深入发动群众，先后建立了五个县工委，两个县和数十个乡的革命政权，建立了四个游击大队，扩大红军六百多人。为适应新的形势，鄂豫皖省委改组为鄂豫陕省委，并建立了豫陕特委。

五月初，敌人集中了四十一个团的兵力，向我鄂豫陕游击根据地发动了“围剿”。省委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先疲后打的方针。六月初，我军自郧西向北，直插商县地区，尔后经商南，奔袭敌荆紫关兵站，歼敌一个营，缴获了一大批粮食、布匹和武器弹药，改善了我军的物质条件。接着，连续四天急行军五百六十里，转回到根据地边缘的黑山街一带，把三天后才尾追上来的敌警备一旅引入袁家沟口我军的埋伏区，一举全歼，毙伤敌三百余人，生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一千四百余人，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红二十五军在创建和巩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歼灭了敌人六个团，牵制了敌人三十七个团；建立和发展了地方游击队，主力红军也发展到了三千七百余人。从此，我军主动地采取军事行动，牵制敌人，配合一、四方面军的长征。

七月，红二十五军翻越秦岭，跨过终南山，前锋到达西安南面的王曲、杜曲、引驾回、子午镇一带，开展群众工作，扩充了新战士三百余人。在这期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地下交通员石健民由上海来到军部，说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北会师，并有北上的动

向。这个重要消息，与《大公报》报道的基本一致。而且我军在殷家卫俘获的伪区长也供认：敌人毛炳文、于学忠的部队已从西安西调，妄图在四川北部进行堵截。省委在长安县灃峪口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配合主力行动，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决定留下豫陕特委书记郑位三及陈先瑞等同志在鄂豫陕游击根据地领导斗争；红二十五军立即西征北上，与红二十六军配合，首先争取陕甘根据地的巩固，牵制和消灭敌人，迎接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北进。徐海东同志在会上表示：“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都牺牲了，也要把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迎接过来！”

七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从子午镇出发，西向甘肃挺进。他们连续行军十几天，经鄂县、盩厔、骆驼口、佛坪、西江，于八月一日占领了陕甘交界的双石铺，消灭了胡宗南部四个连，俘获一个少将参议。从这个少将参议的口供里了解到：红一、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正向北挺进；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已全部西调去阻击北上的红军，其后方留守处设在水天。八月二日，我军便进攻天水。刚打下北关，增援天水的敌军一个旅赶到了。我军乃放弃攻占天水的计划，转向凤凰山、沿河镇，强渡渭水，打下秦安，挺进通渭，截断西兰公路的交通，进抵静宁县城以北五十里的兴隆镇。在这里休息了三天，仍然得不到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北进的消息。八月十七日，我军沿西兰公路东进，一举打下隆德，连夜翻越六盘山，二十日进到平凉、泾川、镇远、合水一带。敌人紧紧追逼。我军在平凉的白水镇和马莲铺以东的打虎山高地，打垮了马鸿宾的三十五师一〇五旅，歼其一个多营；在泾川城西南的四坡村，冒雨消灭了前来突袭的敌一〇四旅二〇八团，击毙敌团长马开基。我军继续西进，威逼崇信，在西兰公路与敌人周旋了十七天，派人四出搜集报纸，访问客商，极力打听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的确实消息，但一无所获。这时，敌人毛炳文部又配合马鸿宾部从背后追来。我军处境十分不利，于是按原计划去陕北。

九月初，红二十五军强渡泾水，经镇原、庆阳、合水县境，沿陕甘边界的山区北进，七日到达保安县豹子川。省委召开会议，鉴于吴焕先政委在泾川战斗中牺牲，决定由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改任政委。九日，部队进抵永宁山。陕北红军的习仲勋、刘景范等领导同志赶来热烈欢迎。尔后，全军三千四百多人经四天行军，到达延川县永平镇，于九月十八日，与刘志丹等同志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陕北红军是在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陕西省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多次领导和发动了武装起义。十月，唐澍、谢子长同志领导了清涧起义，建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一九二八年四月，刘志丹、唐澍同志领导了渭华起义，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在此前后，党还领导了旬邑和周至两县的农民起义等。这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发动了群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锻炼了革命骨干；积累了武装斗争的经验。他们重振旗鼓，继续在陕甘地区组织游击武装，坚持革命斗争。

一九三一年十月，閻红彦、吳岱鋒同志率領晉西游擊隊轉戰到甘肅南梁堡，與劉志丹同志領導的游擊隊會合，組成西北反帝同盟軍，謝子長任總指揮，劉志丹任副總指揮兼二支隊支隊長，楊仲遠任參謀長。部隊利用戰鬥間隙，組織學習了古田會議決議和有關游擊戰爭的文件，輪訓了幹部。一九三二年二月移駐甘肅正寧縣三甲原，改編為中國工农紅軍陝甘游擊隊，總指揮為謝子長，政委為李杰夫（後叛變），下轄兩個步兵大隊和警衛隊、騎兵隊，共三百六十人、槍。二月十六日陽坡頭一仗，消滅進犯之敵五百六十多人；四月十三日襲擊山河，殲敵二百餘人；二十一日攻占旬邑縣城，殲敵三百餘人。在這勝利形勢下，四月二十五日兩當起義，成立了陝甘游擊隊第一支隊；五月五日靖遠起義，又成立了陝甘游擊隊第二支隊。我游擊隊的壯大，引起了敵人的驚恐，敵人糾集了一個旅、四個團和一些地方反動武裝，對陝甘游擊隊分區堵截和重點“進剿”。陝西省委任命劉志丹為總指揮、楊仲遠為參謀長，率領部隊粉碎敵人的“進剿”。他們五月十七日首戰鳳凰山，殲滅守敵五百多人。這時，我軍也擴大到了一千五百多人。隨後，轉戰於白水、宜君中部一帶，半个月戰鬥九次，殲敵一千四百餘人，粉碎了敵人的“進剿”。十一月，紅二十四軍失敗後保留下來的部分人員，從河北轉戰到陝甘地區，與劉志丹領導的陝甘游擊隊合編為紅二十六軍，實際上只有四十二師二團，軍長劉志丹，中央代表兼政委杜衡。

杜衡積極推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主張冒險進攻，而在敵人的“圍剿”面前又驚慌失措。一九三三年五月底，他擅自決定率領紅二十六軍的紅二團離開照金根據地，南渡渭河。結果戰鬥失利，部隊大部散失。杜衡本人後來叛變投敵。劉志丹、王吉泰等十幾名同志突圍出來，回到照金根據地，與因負傷留在當地堅持游擊戰爭的習仲勛等同志會合，將富平、渭北兩支游擊隊和陸續歸隊的失散人員，組建了紅二十六軍第四團，共一百二十餘人，七、八十支槍。部隊在戰爭中又獲得了新的發展。十一月七日，組建紅軍二十六軍四十二師（原無師部），下轄第三團和騎兵團（由四團改編而成），師長王吉泰，政委高崗，參謀長劉志丹。一九三四年一月，王吉泰調去做兵運工作，高崗又犯了錯誤，遂改任劉志丹為師長，楊森為政委。他們帶領部隊於四月十一日襲擊合水縣西華池，全殲守敵一個團部和兩個整營，共七百多人；五月十日全殲三里原守敵兩個連，一百八十多人；並橫掃了各地民團，從而建立和擴大了以南梁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

一九三四年七月，遵照北方局的指示，在安定縣楊道峁成立中國工农紅軍陝北游擊隊總指揮部，謝子長為總指揮，下轄四個支隊。八月，謝子長同志根據陝甘特委和四十二師師委聯席會的決議精神，帶領紅三團和陝北游擊隊一、二、五支隊由南梁北上，支援陝北游擊隊反擊敵人的進攻，鞏固和發展革命根據地。八月十七日在安定縣的吳家場殲敵一個連；二十二日在清澗的張家圪台殲敵兩個排；二十六日又給清澗河口鎮的守敵以沉重打擊。連戰皆捷，群情振奮，先後成立了安定縣、吳堡縣革命委員會；陝北游擊隊也得到了發展，改編為中國工农紅軍二十七軍，謝子長為軍長。這個軍實際上只有一個

师即八十一师，师长杨奇（后为贺晋年），政委张达志。

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动摇了敌人的统治。蒋介石急忙从河南调来了反共主力高桂滋所部八十四师，并纠集陕、甘、宁、晋四省的军阀部队，共二十三个团，四万余人，对我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为了有效地反击敌人，陕甘、陕北两特委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在赤原县（今子长）周家硷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工委书记是惠子俊，到职前由崔田夫代理；军委正副主席是谢子长、刘志丹，谢子长因在清涧的河口镇战斗中负重伤，二月二十一日逝世后，由刘志丹接任主席。刘志丹同志按照联席会上确定的作战方针——集中红军主力，首先打击孤军深入我陕北根据地的敌八十四师，尔后向南、向西发展——，率领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红八十一师一、二、三团共二千余人，集结于玉家湾、魏家岔、蜜蜂峪一带，待机歼敌。五月七日，我军设伏于吴家寨附近的铺儿上，全歼敌八十四师的一个连。敌驻杨家园的一个营倾巢出动驰援，被红军和赤卫队重重围困起来，全部消灭。九日，在马家坪又全歼敌八十四师的一个辎重营和一队地方反动武装，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敌八十四师接连三天吃了苦头，被迫收缩据点。我军则乘胜解放了安定城，并向南挺进。二十日，在张家圪台全歼敌八十四师一个连；二十九日，攻克延长县城，全歼敌八十四师一个连和民团、警察等。延川守敌弃城而逃，延川宣告解放。六月十二日，攻克安塞县城，歼灭民团二百余人，俘获新旧两任伪县长。十七日，强攻李家塬，这里是把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分割开来的反动堡垒，经过激烈的战斗，全歼守敌二百余人，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块。接着又乘胜扩大战果，攻克靖边，全歼敌八十六师一个营；保安城守敌八十六师一个营闻风逃窜；又在定仙娥消灭晋军一个团。我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主力红军扩大到五千人，游击队发展到四千人，在二十余县建立了革命政权，苏区面积约三十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十多万。

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会师后，组成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七十五师、七十八师和八十一师。

红十五军团成立后，随即进行了甘泉的劳山战役。这是第三次反“围剿”的重要一仗。我军采取围城打援的方针，以一个团和游击队围攻甘泉城，诱敌驰援，把主力埋伏于援敌必经的劳山地区的山头上。十月一日下午，从延安赶来增援的东北军——〇师的两个团和师直属队进入我伏击圈，我军前堵后截，两面夹攻，把敌人压到一条狭长的山沟里，全部歼灭，击毙敌师长贺立中。不久又在甘泉的榆林桥消灭了敌人一〇七师的四个营，活捉了敌团长高福元。他们以战斗的胜利，挫败敌人的“围剿”，为迎接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的到来扫清道路；他们以战斗的胜利，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万里长征的落脚点。

四、紅一方面軍与紅四方面軍的会师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红一方面军除留下三万余人，由项英、陈毅、贺昌、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梁伯台、陈潭秋等同志领导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突围长征外，主力红军连同中央机关人员共八万六千人，开始突围长征。

参加长征的部队，有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下辖一师、二师、十五师，共九个团；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下辖四师、五师、六师，共九个团；董振堂、李卓然率领的红五军团，下辖十三师、十四师，共六个团；周昆、黄甦率领的红八军团，下辖二十一师、二十三师，共六个团；罗炳辉、蔡树藩率领的红九军团，下辖二十二师、三师，共六个团；以及叶剑英、邓发率领的中央军委纵队等。

长征初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者，又犯了转移中的逃跑主义的错误。他们把红军的战略转移当作一种惊慌失措的避战逃跑，不但不主动争取必要的和可能的战机歼灭敌人，也不进行长途行军的战斗准备和政治动员，而是采取消极被动的大搬家式的行动。当时，庞大的军委纵队和后方机关多达三万人，各个军团都成立了庞大的后勤机关，有的挑夫竟多达千人。由于辎重笨重，红军在敌人重兵围追堵截下，行动极其困难。红军多是在夜间，沿羊肠小道行军，常常是一夜只能翻越一个山头，弄得人困马乏，非常被动。我军虽然经过近一个月的艰苦奋战，先后于十月二十一日，突破了敌人设在江西安远、信丰间的第一道封锁线；十一月三日，突破了敌人两个旅又两个团设在湖南桂东、汝城之间的第二道封锁线；十一月十三日，突破了敌人两个师又两个团设在湖南郴县、宜章间的第三道封锁线，但是仍未能摆脱困境。

十一月下旬，我军到达了湘江东岸。这时，蒋介石急调十五个师又两个旅以及地方军阀武装共四十万人马对我军布置了第四道封锁线：国民党中央军薛岳纵队和湖南军阀何键所部，在零陵、东安、全州一带，沿湘江布防；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所部则集结在兴安、灌阳一带布防，对我形成了钳形阵势；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湖南军阀之一部在后面追击。蒋介石企图消灭我军于湘江东岸，或者压入广西境内，使红军与桂系军阀两败俱伤，而坐收渔利。面对敌人重兵，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者，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只指望能渡过湘江，与二、六军团会合，解除困境。因此，命令一军团死打硬拚，夺路前进；命令三、八、九军团在两侧打雨道式的掩护战，顶住敌人，掩护中央军委纵队通过湘江；命令五军团作后卫，节节抗击尾追之敌。我军在广西全州以南湘江东岸与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激战了七昼夜，虽然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渡过了湘江，却付出了人员伤亡过半的惨重代价。在湘江战役中，红军的战斗精神是可歌可泣的。例如李天佑、钟赤兵同志指挥的五军团的两个团在灌阳新墟附近阻击敌人，在绝对优势敌人的轮番进攻下，英勇顽强地坚守阵地。在战斗中两个团的团长、政委都牺牲或负重伤，一个团伤亡达五百余人，但他们在未接到撤

退命令以前，始终坚守着阵地，表现了红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蒋介石为了阻挡红一方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又急调数十万大军在湘、黔、川边境设立第五道封锁线。当时，我军只剩下三万余人，战斗力空前削弱，如果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与五、六倍于我的敌人正面直顶硬拼，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正是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早已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剥夺了军权的毛泽东同志挺身而出，在湖南的通道城积极地向军委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出其不意地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摆脱被动局面。毛泽东同志这个及时的英明主张，得到了军委大多数同志的赞成，于是才有了著名的“通道转兵”。毛泽东同志从此参加了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这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我军在“通道转兵”以后，连战皆捷。十二月十四日，攻克贵州的黎平，击溃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两个团。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接着，我军以锐不可挡之势，大败王家烈、侯之担所部四个团，连克锦屏、剑河、台拱、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城。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在黄平的猴场举行会议，否决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仍要带部队回头东下与二、六军团会师的错误主张，作出了《关于野战军过乌江后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使党和红军摆脱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红军应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以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为此，红军必须求得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来有把握地取得胜利。决定还强调：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从而进一步肯定了红军的战略方向，并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的指挥权作了组织上的约束。

一月四日，我军在沿途击溃了敌人的四个团之后，到达了乌江南岸江界渡等地。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受领了首先突破乌江的战斗任务，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同志亲自化装到江边侦察敌情和地形，组织部队进行偷渡和强渡。第三次强渡时，连长毛正华等二十二位英雄最先登上乌江北岸。我军突破乌江天险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北岸守敌，一鼓作气，追击溃敌二百里，于一月七日乘胜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和湄潭、绥阳、桐梓等城，前锋挺进到川黔边境的松坎场，歼灭了黔敌侯之担师，击溃了川敌廖泽旅，控制了黔北地区。

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使我军转危为安，很快摆脱了被动局面，部队在遵义地区休整了十二天，补充了新战士四、五千人。

一月九日，在遵义召开了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云、刘少奇、朱德、邓发、凯丰；扩大参加会议的有李富

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列席参加会议的有邓小平、李德、伍修权等。会议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方面的错误，批判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以及关于改组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撤换了“左”倾分子的领导职务。会议决定：由张闻天同志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同志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成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为副的中央军事指挥小组，全权统帅全国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实际上形成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当遵义会议决议精神传达到部队时，群情振奋，胜利的信心倍增。遵义会议后，部队进行了整编。一军团缩编为两个师六个团；三军团缩编为四个团，撤销师的建制；五、九军团各缩编为三个团，撤销师的建制；撤销少共国际师的建制。八军团在这之前业已撤销。在整编中还精简了机关和后勤人员，充实了连队；同时，加强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使部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中央军委深入分析了形势，认为：黔北地区，处于长江和乌江之间，回旋余地小，目前敌人一百五十个团的兵力麇集在遵义周围，使红军发展很不利。而在四川，军阀邓锡侯、刘湘、田頌尧等正在互相混战，内部矛盾重重；我红四方面军已在川北的通江南部、巴中地区建立了拥有三、四百万人口的革命根据地。如果红一方面军进入四川，与活动在川北的四方面军和活动在川湘边境的二、六军团互相协同配合，既可以向东向南发展，赤化全四川，还可以北出陕甘，推动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因此，中央军委放弃了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于一月二十日发出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指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应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间活动来牵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号召全军指战员高举苏维埃的红旗打到四川去。

一月二十日前后，我军分别从遵义地区出发，西渡赤水；二十六日，攻克箭滩、黄皮洞、复兴场等地，击溃敌两个旅又一个团；二十八日，攻占青杠坡，歼敌一部；二月二日，攻占三岔洞，击溃敌人一个旅，并迅速向长江推进。

党中央在红一方面军从遵义向西挺进后，于一月二十二日致电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指出：“为选择良好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争取赤化四川”。“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在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为了实现这一战略计划，中央命令四方面军：以群众武装和独立师团向东线活动。集中红军主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威逼重庆，